

## 西夏雕版印刷初探

白 滨

西夏是中国古代以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正式建国于北宋宝元元年（1038），至南宋宝庆三年（1227）被蒙古灭亡，立国长达190年。其鼎盛时期疆域，领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及青海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境土方二万余里”。西夏王朝曾先后同辽、宋、金王朝鼎足而立，占有重要地位。党项羌族同汉、契丹、女真等民族一样，为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创造中古时期的灿烂文明，特别是在对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杰出贡献的雕版印刷方面，同样有过辉煌的成就。

### 一

党项羌族及其建立的西夏王朝，多方面的吸收和借鉴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对其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则不遗余力，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模仿和借鉴汉字创造的记录党项族语言的西夏文字，就是他们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成就之一。党项羌族本无文字，西夏建国前夕，李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sup>①</sup>这种新创制的西夏文字，西夏仁宗时期的语言文字学家骨勒茂才在其所著《蕃汉

合时掌中珠》序言中称它与汉文字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字的创制与使用，为在西夏“引进”和发展雕版印刷成为可能，提供了先决条件。一种奇特的文字，独树一帜，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放射异彩，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共同创造的宝贵文化财富之一。

西夏雕版印刷于史无征，本世纪以来，由于西夏时期文物文献的大量发现，其中有许多雕版书籍珍品，西夏有雕版印刷的事实才逐渐为世人所知。现据已知出土的西夏时期刻本注明或经考证知其年代者列表于下（见下页）：

上表所列的雕版印刷书籍，是根据已发现的西夏文时期文献中注明年代或可考其年代者。由于出土的西夏文献大多严重残损，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刊本书籍，虽确知其为西夏时期刊本无疑，但因无法确定其刊刻年代而不能列举在表中，这些刊本书籍当然是反映西夏雕版印刷不可忽视的。现将确知为西夏时期的雕版印刷书籍未注明年代者按内容分类略述如下：

（一）世俗书籍：本世纪初在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附近）出土的西夏印本书籍，今藏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这一类中有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论语》、《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贞观要文》、《十二国》及《列子》、《左传》、《周书》、《孔子语》、《毛诗》等译本和汉文曹道安著《德行记》等。西夏人著的西夏文分类字典《杂字》，分类西夏文汉文字典《要集》。西夏文文学著作有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佛家劝善著作《到贤》等。以上均为刊本蝴蝶装。此外还有经折装的历书残页，卷子装《西夏官阶封号表》等。

（二）佛教经典：西夏时期曾大量刻印佛经，主要是汉文佛经和西夏文佛经。现在留传于世的各种西夏文佛经和西夏时期刻印的汉文佛经，据粗略统计，约有四、五百种之多。其中除去写

| 序号 | 刻书年代                        | 书 名                     | 装帧  | 文种  | 备 注            |
|----|-----------------------------|-------------------------|-----|-----|----------------|
| 1  | 惠宗·天锡礼<br>盛 国庆五年<br>(1073)  | 大般若波罗密<br>多心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2  | 大安十年<br>(1084)              | 大方广佛华严<br>经普贤行品愿        | 卷子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3  | 崇宗·贞观时<br>期<br>(1102—1114)  | 贞观玉镜统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          |
| 4  | 崇宗正德二年<br>之后<br>(1128—1139) | 文 海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②         |
| 5  | 正德六年<br>(1132)              | 音 同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br>有不同版本 |
| 6  | 仁宗·大庆二<br>年(1141)           | 圣观自在大悲<br>心总持胜相顶<br>尊总持 | 蝴蝶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③         |
| 7  | 人庆三年<br>(1146)              | 妙法莲华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8  | 天盛年间<br>(1149—1169)         | 天盛改旧新定<br>律令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          |
| 9  | 天盛四年                        | 注华严法界观门                 | 卷子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序号 | 刻书年代                         | 书 名                        | 装帧  | 文种  | 备 注           |
|----|------------------------------|----------------------------|-----|-----|---------------|
| 10 | 天盛十三年<br>(1161)              | 大方广佛华严经<br>普贤行愿品           | 经折装 | 汉文  | 黑水城出土         |
| 11 | 天盛十九年<br>(1167)              | 佛说圣佛母般若<br>波罗密多心经          | 经折装 | 汉文  | 黑水城出土         |
| 12 | 天盛十九年<br>(1167)              | 金刚般若波罗密<br>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13 | 天盛二十年<br>(1168)              | 金刚般若波罗密<br>经               | 经折装 | 西夏文 |               |
| 14 | 乾祐四年<br>(1173)               | 西夏文韵书残页                    |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         |
| 15 | 乾祐十二年<br>至十三年<br>(1181—1182) | 类 林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br>刻印司刊 |
| 16 | 乾祐十四年<br>(1183)              | 圣立义海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br>刻印司刊 |
| 17 | 乾祐十五年<br>(1184)              | 佛说金轮佛顶<br>大威德炽盛光<br>如来陀罗尼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重<br>版   |
| 18 | 乾祐十五年<br>(1184)              | 佛说圣大乘三<br>归依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序号 | 刻书年代                         | 书 名             | 装帧  | 文种  | 备 注             |
|----|------------------------------|-----------------|-----|-----|-----------------|
| 19 | 乾祐十五年<br>(1184)              | 圣大乘胜意菩<br>萨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20 | 乾祐十六年<br>(1185)              | 六字大明王功<br>德略    | 卷子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21 | 乾祐十六年<br>(1185)              | 金光明最胜王经         | 经折装 | 西夏文 | 北京图书馆藏<br>重刊本④  |
| 22 | 乾祐十六年<br>(1185)              | 佛经发愿<br>文残页     |     | 西夏文 | 武威下西沟岷<br>出土    |
| 23 | 乾祐十六年<br>至十七年<br>(1185—1186) | 西夏诗歌集<br>残本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           |
| 24 | 乾祐十八年<br>(1187)              | 新集锦合辞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           |
| 25 | 乾祐十九年至<br>二十年<br>(1188—1189) | 贤智集             | 蝴蝶装 | 西夏文 | 黑水城出土           |
| 26 | 乾祐二十年<br>(1189)              | 观弥勒菩萨上生<br>兜率天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br>(十件)   |
| 27 | 乾祐二十年<br>(1189)              | 金刚般若波罗<br>密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br>(三十五件) |

| 序号 | 刻书年代                  | 书 名                          | 装帧  | 文种       | 备 注             |
|----|-----------------------|------------------------------|-----|----------|-----------------|
| 28 | 乾祐二十年<br>(1189)       | 普贤行愿品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br>(十三件)  |
| 29 | 乾祐二十年<br>(1189)       | 观世音菩萨普<br>门品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30 | 乾祐二十一年<br>(1190)      | 番汉合时掌中珠                      | 蝴蝶装 | 夏、<br>汉文 | 黑水城出土           |
| 31 | 仁宗时期<br>(1140—1193)   | 圣德慧到彼岸功<br>德宝集偈              |     | 西夏文      | 黑水城、武威<br>天梯山出土 |
| 32 | 仁宗时期<br>(1140—1193)   | 四分律行事集要<br>显用记               |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33 | 桓宗·天庆<br>二年<br>(1195) | 佛说转女身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34 | 天庆二年<br>(1195)        | 大方广佛华严经<br>入不思议解脱<br>境界普贤行愿品 |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35 | 天庆三年<br>(1196)        | 普贤行愿品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36 | 天庆七年<br>(1200)        | 圣六字增寿大<br>明陀罗尼经              | 卷子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序号 | 刻书年代                  | 书 名                                            | 装帧  | 文种  | 备 注            |
|----|-----------------------|------------------------------------------------|-----|-----|----------------|
| 37 | 天庆七年<br>(1200)        | 密咒圆因往生集                                        |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38 | 襄宗皇建元年<br>(1210)      | 佛说大乘圣无量<br>寿决定光明王如<br>来陀罗尼经<br>佛说般若波罗密<br>多人心经 | 经折装 | 汉 文 | 黑水城出土          |
| 39 | 神宗，光定<br>四年<br>(1214) | 金光明最胜王经                                        |     | 西夏文 | 西安市文管处<br>藏抄本⑤ |

本佛经和经考定为元代木活字版佛经外，用西夏文雕版印刷的佛经和未注明年代的汉文佛经估计尚可占总数之半。从上列表中可以看出，西夏时期从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至神宗光定四年（1214）有可考年代刊印的28种佛经中，其中仅有5种是属于西夏文经，汉文佛经达23种之多。这里并不是说西夏时期刻印的西夏文佛经不多，如据佛经题款中记载，仅仁宗乾佑二十年（1189）由皇帝主持的两次大法会上发愿施印“番”、“汉”文佛经共四十万卷。桓宗天庆二年（1195）罗太后发愿散施“番”、“汉文”经共九万三千部。这里的“番”、“汉文”佛经应指西夏文和汉文佛经，每次散施这么多数量的佛经，当然是印刷的佛经。另据一方西夏文押捺题款证实，西夏时期在贺兰山佛祖院曾雕印了全部汉文大藏经版，并至少印刷过十二部汉文大藏经。由此可知西夏时期刊印汉文大藏经和西夏文经都不在少数。从现存的西夏文佛经来看，如果没有注明确切的刻印年代，

我们很难确定哪些是西夏时期刻印。这是因为元代曾大量雕版印刷西夏文佛经，如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有元一代共雕印西夏文大藏经近200部，计70万卷，当时称河西字大藏经。也有相当数量在西夏时期翻译、校勘的西夏文佛经，西夏时期未曾雕印过，到元代才开始雕印；也有西夏时期初刊，到元代又重版刊印的。总之，我们在论及西夏时期的雕版印刷佛经，无论是西夏文佛经或是汉文佛经，如无绝对年代可证，则要慎重考察，切不可轻以文种判定其年代。

（三）雕版佛画：在传世的西夏时期雕版佛经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雕版佛画。这些佛画大部分是佛经卷首的扉画和佛经内容的插图，也有单幅佛画。版画是最能反映雕版印刷技术水平的，因为从版画的镌雕与印刷上都比单纯雕印文字复杂的多，这些佛画充分显示了西夏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高度水平。如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黑水城所获西夏文中，绝大多数是雕版佛画，据斯坦因公布的目录，约有50余件雕版画残页。又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百余号西夏文佛经中，有近30号中有扉画与插画。这些佛画有的因残损过甚，有的无法考其刊印年代，在探讨其雕印技术时，如上文已指出的应当首先断代。现在确知其为西夏时期刊印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则是一部首尾完整的，包括扉画、题图与经文插图的图解本佛经，共有版画55幅。其版面结构、刀法技巧、艺术风格等都如实地反映了西夏时期雕版印刷的水平，是研究西夏时期雕版印刷的珍贵资料。

## 二

有关西夏的雕版印刷在汉文史籍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在出土的西夏文献中也仅略有涉及而语焉不详。现在只能根据已发现和传世的各类西夏时期刻印本书籍、实物等及其中有关的记载，进行钩稽、探索，以图初步展示西夏时期雕版印刷的概貌。

(一) 西夏传入雕版印刷年代：现在所知有确切年代记载的西夏时期刻印本书籍是刻于夏惠宗李秉常天 赐 礼 盛 国 庆 五 年（1073）的汉文佛经《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该经由信徒陆文政私人发愿，为亡故父母乞求冥福所刻印。其次是夏 大 安 十 年（1082）西夏大延寿寺僧人守琼施印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西夏从建国前的李德明在位时期，经建国之后景、毅、惠三朝四十年中，六次向宋朝求取佛经，为在西夏翻译佛经做了准备，同时也为在西夏刻印汉文佛经提供了底本。西夏向宋朝赎经，最后一次在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此后便不再有赎经的记载，恰恰在这时起，西夏出现了自己的汉文刻经，说明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西夏从宋朝引进了雕版印刷，自己有了印经能力，所以此后便停止了从宋朝赎取佛经。当然，根本原因是由于西夏佛教的迅速发展，靠向宋朝求取佛经已不能满足需要时，促使西夏信徒在本土上刻印佛经是经济而便当的。西夏从刻印汉 文 佛 经 开 始，大约到仁宗时期才开始有西夏文佛经刻本问世。西夏从景宗时起开始用西夏文译经，至崇宗天佑民安元年（1090）已经翻译完三千五百七十余卷西夏文佛经，称西夏文大藏经，或称“番文大藏经”。但可能在这个时期尚不具备雕印西夏文佛经的条件，即从宋朝进入西夏的汉族刻工，他们一时还难以认识和掌握这种奇特繁难的文字，并付之于刀木之上。掌握西夏文字的党项人或西夏人也短时期内难以学会雕印技术。

(二) 西夏雕版印刷的种类：据上表所列举，西夏时期采用西夏文雕印书籍是从崇宗贞观年间(1102—1114)开始，即这个时期刊印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表列39种有年代可考的雕印书籍中，惠宗时期2种，崇宗时期3种，仁宗时期27种，桓宗时期5种，襄宗、神宗时期各1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仁宗时期是西夏雕版印刷事业的鼎盛时期。还可以看出，在表列39种中，凡属世俗性质的书籍基本上都是用西夏文刻印的；在30种佛教经典中，

有24种用汉文雕印,仅有5种用西夏文雕印。用西夏文刻印佛经最早的是仁宗天盛二十年(1168)所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比其时更早刻印的西夏文经尚未发现。从西夏时期的世俗著作西夏文刻本和汉文佛经刻本比较,无论是雕版技术或印刷质量,西夏文世俗本都远逊于汉文佛经,可以说这些西夏文刻本都应出于西夏人之手。与上述情况相印证,再次说明西夏时期引进雕版印刷是用汉族刻工刻印汉文佛经开始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夏本土本族刻工还未能雕印卷帙浩繁且文字复杂的西夏文佛经译本。这个时期,由西夏王朝颁布的重要律令,规范国家语言文字的工具书,为推行儒家文化翻译的汉文经典著作,需要广布于世的,即由通西夏文字的西夏刻工雕印,这些西夏文刻本无不表现了西夏初期雕印技术的粗拙。

(三) 西夏雕版印刷机构与刻工: 据夏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颁布法典的《天盛旧改新定律令》中记载国家机构的《司次行文门》所规定,在中央机构中设有“刻印司”,属第五等级的末等司。说明起码在仁宗时期雕版印刷事业已由国家统一管理,并刻印颁布国家律令。据此可以判断,崇宗贞观时期(1102—1114)颁刻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至崇宗时期刊行规范国家语言文字的重要著作《文海》、《音同》等,说明这个时期已经建立了由国家管理的雕版印刷机构。“刻印司”是管理机构,同时也设立刻印作坊,仁宗乾祐十二年至十七年(1181—1186)刊印的西夏文字典《类林》,辞书《圣立义海》和西夏文诗集刊印本后都注明了“刻印司刊印”的字样。以上称之为官刻本。其次是寺院刻本,表列西夏仁宗、桓宗、襄宗、神宗四朝,用汉文或西夏文刻印的佛经,都是由皇帝或皇太后发愿,由国家出资雕版印造,动辄几万、几十万份。这些承担皇家印经的寺院已知的有惠宗时期的大延寿寺,仁宗时期的大度民寺、温家寺,襄宗时期的普化寺,以及西夏时期的贺兰山佛祖院,黑水城、贺

兰县寺庙等。寺院刻经也属官刻，由于雕印佛经在寺院中，故称其为寺院刻本，在这些刻经中一般有皇帝的御制刻经发愿文，有“命工镂板”、“仍敕有司，印造斯经”，所以寺院是官刻的一种。西夏有私人出资刻经的，如表列惠宗时期的信徒陆文政，僧人守琼，仁宗时期的宗室嵬名直本，僧人刘德真、智通，施主袁宗鉴等人，桓宗时期的信士仇彦忠等人，襄宗时期的僧人张盖利、李智宝，以及西夏时期贺兰山佛祖院僧人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这些私刻有的纯由个人出资，如仁宗天盛四年（1152），僧人刘德真雕印《注华严法界观门》，在其发愿文中称：“今者德真幸居帝里，喜遇良规，始欲修习，终难得本。至以口授则音律参差，传写者句文脱谬，致罢学心，必成大失。是以恭舍囊资，募工镂板，印施流通。”<sup>⑥</sup>有的为佛教信徒集资雕印，如仁宗人庆三年（1146），由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本为首雕印的《妙法莲华经》施经发愿文中记载：“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同为法友，特露微诚，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为结缘之首，命工镂板，其日费饮食之类，皆宗室给之。雕印斯经一部，普施一切同欲受待”。<sup>⑦</sup>其中就有多名雕字工人共同发愿施经。还有的由寺院主持僧人等出资雕印，如在一方西夏文押捺题款中注明的：“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李慧目，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刷十二部大藏契经及五十四部《华严》……”<sup>⑧</sup>。西夏时期是否存在民间私人刻坊，目前尚未有资料可证实。

西夏时期的刻工，见于记载的除上述仁宗人庆三年（1146）刻印《妙法莲华经》中的“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人外，见诸记载的还有天盛十三年（1161）雕印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注明“京市周家寺僧雕字王善慧”，前后两次刻经的王善惠为同一时代，可能是同一人，当是西夏仁宗时期著名的刻工之一。此外，有刻工记载的还有襄宗皇

建元年(1210)刻印汉文《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等经的智圆和尚。大多数西夏刻工则没有留下姓名,或是在残缺破损的印本书籍佛经中失去了他们的名字。

(四) 西夏雕版印刷版式与刊本装帧: 现在已发现的西夏时期刊本装帧主要有卷子装、经折装和蝴蝶装三种。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世俗著作及汉文典籍译本一般是蝴蝶装, 版面则大小不一。版心一般在长15厘米至23厘米, 宽10厘米至15厘米之间。版刻多白口, 四周单边, 或双边; 或上下单边, 左右双边。版心中缝有鱼尾, 也有无鱼尾的, 上方刻书名, 下方刻页码。单页6—9行不等, 有的用单线分行。版面上还常在字行空隙处雕置梅花、菱花、星花等几何图案饰物。但从雕版技术上看都比较粗糙, 不规整。

西夏时期刻印的汉文或西夏文佛经, 主要是卷子装和经折装, 也发现有蝴蝶装。版心行数与字数不等。如西夏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刻印的佛经残页, 经折本, 单页高6厘米, 上下双栏, 单面7行, 行8字。敦煌莫高窟收藏的图解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为西夏时期有特色的经折本佛经, 据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一文介绍: “页面高20.5、宽9厘米。扉页版画《水月观音图》, 为双面通栏, 高15.5、宽17.5厘米。经文及图解部分, 上下为双栏, 无界, 天头3、地脚2厘米。版面分上、下两栏, 上栏约4厘米, 安排版画; 下栏约11.3厘米, 排印经文。文、图均按由右至左的顺序展开。经文部分每面5行, 每行绝大多数为10字, 少数页面则为9字。经末有三行通栏发愿文, 第一行14字, 第二、三两行均各10字, ……字体为西夏小楷, 字形大小不尽相同, 笔锋粗细亦不一致, 书法好坏程度有差。可见并非同一个书手和工匠所书写, 可能系多人分工合作。经文刻工比较粗简草率, 刀法不够遒劲流畅, 字形亦不够标准化和规范化”。<sup>⑨</sup> 这个描述反映了西夏雕印本佛经的一般情形。黑水城出土, 已列入表中的西夏时期雕印的汉文佛经,

则大多是精美之作，与宋刻本相比毫不逊色，可能这些汉文佛经的刻工都来自宋朝。1990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西夏时期的佛塔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字木雕版和西夏文刻本残页，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等。木雕板残块计2000余块，大部分板上两面刻字，部分板一面刻字。字号分大、中、小三种。每0.6厘米至1.2厘米见方不等。在一块大号字版上，中间有宽1厘米的中缝线，单面6行，行距0.6至0.8厘米，字距0.1厘米，中缝上刻西夏文书名3字。其中一块小号字版残高10厘米，长38.5厘米，厚1.2厘米，由两块板拼对在一起。字行距0.5至0.7厘米。这些字版，字体方整秀丽，刻工细腻有力度。这些新发现的木雕板，虽已残损过甚，有的已经炭化，但还能清晰辨认字迹，反映了西夏时期雕版技术水平。

（五）西夏雕版印刷书籍版本与印数：西夏雕版印刷书籍、佛经，因修订与社会需求也往往重版印刷。如西夏文字典《音同》，至今已知道至少有五个版本：1.正德六年(1132)切韵博士令六犬长、瑞灵长初编本；2.学士浑□白、勿明犬乐得等增改本；3.学士兀罗文信重校刻印本；4.梁德养重校整理刊印本；5.义长重校刊印本。又如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刊印的骨勒茂才著西夏文汉文对照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目前所见到的至少有两种版本，两种版本在序文、辞语排列、注音字等都略有差异。西夏仁宗天盛时期(1140—1194)编纂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据已发表的原件影印本来看，是由多种不同版本的页面拼合整理的。

西夏重版印刷佛经当多于世俗著作，据乾祐十五年（1184）由袁宗鉴等17人印施的《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如来陀罗尼经》，经末明确标明“重开板印施”字样，可知该经已经雕印过。据黑水城发现的夏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印施《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今存10件，对其版本进行比较后看出了“原来各种印本是由4个不同的雕版印刷的。这就是说雕版至少换过4

次，可见印数确实很大”。<sup>⑩</sup>同时发现的罗太皇施印的《金刚经》，今存有35件，另一种《普贤行愿品》，存13件，它们都是用两大套不同的雕版印刷的。

西夏时期雕版印本书籍与佛经数量，现在尚难有精确统计，凡经一再重版的世俗著作、律令、辞书等都不在少数。而佛经施印更是数量惊人。根据一些刻经发愿文中记载，如天盛十九年（1167）仁宗所刻印经“开板印造番、汉共二万卷散施臣民”，仁宗另一次所刻印“番、汉（经）一万五千卷，普施国内”。乾佑十五年（1184），仁宗又“印造斯经番、汉五万一千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乾祐二十年（1189），“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桓宗天庆二年（1195），罗太后施印“八塔成道从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又据一枚西夏文押捺题款记载，西夏时期在贺兰山佛祖院曾雕印了全部汉文大藏经板，并至少印刷过十二部汉文大藏经。<sup>⑪</sup>

（六）西夏雕版印刷的意义与作用：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发展的黄金时代，与西夏先后并存的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在雕版印刷上也有过各自的辉煌贡献，如著名的辽刻《契丹藏》和金刻《赵城藏》，都是举世闻名的汉文大藏经雕印本巨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亡佚，在几百年来几乎成为不可解的迷，其雕版印刷的状况就更鲜为人知。本世纪初黑水城遗址中西夏文书的发现，西夏有过雕版印刷的辉煌时代才逐渐被人知晓。事实说明了反映中华民族文明成就的中古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同样传入西夏，党项族和汉族人民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使它在中国的大西北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西夏时期雕印的西夏版汉文大藏经——《西夏藏》，大量的西夏文世俗作品印本与西夏文佛经，以及从

西夏时期就已经译成，到元代才全部雕印完毕的《西夏文大藏经》，都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西夏文字雕版印刷书籍和用西夏文翻译雕印佛经，开创了我国用少数民族文字大量雕印书籍的先河，其后也不多见。它至今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大规模雕刻河西字大藏经版，即西夏文大藏经版，主持刻印西夏文大藏经的又多是西夏后裔与党项族人，他们也因此元朝的政治、文化与宗教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可以说西夏及其党项民族不仅从宋朝学习、传播雕版印刷技术，并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在向元朝传布和发展元代的雕版印刷也同样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注：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关于《文海》的刻印年代，因其原件采用宋朝旧纸，背面有汉字“宣和七年”和“建炎二年”字样，故其刻印可能在夏正德二年（1128）之后的崇宗时期。

③⑩见〔苏〕孟什科夫《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注明年代为夏仁宗时期（1140—1193）。

④此经前人推定为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刻本，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定其为蒙古帝国皇后乃马真之时（1245—1247），但据该经跋文中有“番国旧版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故知有西夏时期刻本。

⑤该经今未见刻本，据西安市文管处收藏之西夏文泥金字写本有神宗光定四年（1214）之御制发愿文称：“延请番汉法定国师译主等，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仔细比较，刻印流行”之句，可见该经其时新译后又重刻印。与仁宗时期该经西夏文译本关系，待考。

⑥⑦⑧⑪参见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⑨《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

列毓孿儲酸散璵

殺

外苑綉蔭設銷路



龍魂殿神像

執禮備祀

龍藏經卷之四

魏飛渡薩

既散衆越嶺而修經列於藏  
通補遺錄并編聖經藏